

中国核战略思想起源初探(1945—1955)

牛 军

内容提要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做出了研制核武器的重大决定。此前,他们对核武器问题的思考始于1945年8月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不久,持续长达十年。这期间他们的思考和论述内容既独特也很丰富,包括了核武器在不同类型的战争中的作用、核武器在世界政治中尤其是对当下重大国际问题的影响、核武器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军队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与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关系等。其中,诸多部分有明显的连续性,这对后来的中国核战略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核武器 核战略思想 国家安全

本文主旨是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早期核战略思想的缘起与形成过程。这里所谓“早期核战略思想”是指从1945年8月到1955年1月,中国领导人从开始思考核武器问题到下决心研制核武器过程中形成并对后来中国核战略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在这十年中,在中国发生了国共爆发内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性转变;与此转变相关联的是中共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领导人,故为叙述方便,本文统一使用中国领导人的称谓。也是在

* 牛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此十年中,国际上相继发生了日本战败投降、美苏冷战爆发和美苏开始核军备竞赛等重大事件。在如此复杂交织和迅速变化的国内外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对战争和世界政治的影响等问题做了长时间的思考和回应,其内容主要包括了核武器在不同类型的战争中的作用、核武器在世界政治中尤其是对当下重大国际问题的影响、核武器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军队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与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关系等。中国领导人在做出研制核武器的最终决定时的关键动力,的确是同建设世界大国的目标紧密相连的。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出版委员会于1987年出版了《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首次叙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55年1月15日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原子能问题,并做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该书明确说明,“中国发展核工业,当时的方针是首先用于军事目的”,即研制原子弹。^①此后,有关论著都沿用该书叙述,中共中央研究机构出版的有关年谱和领袖人物传记等,也确认了此次会议召开的基本事实。^②本文据此将1955年定义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元年,并以此为起点,追溯和梳理中国领导人做出如此重大决定的原因和他们思考的脉络和主要内容。概括地看,以往的有关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1955年初做出上述决定的具体背景和过程,包括了中苏关系的影响,并大致阐述了这一决定的重要意义,等等。^③其不足之处是尚缺乏系统和深入分析之前十年里,中国领导人在急剧变动的国家安全环境和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背景下,针对核武器的产生极其复杂影响的思考的过程,以及由此逐步形成的指导后来中国核战略的重要思想。实际情况是,他们在这个时期思考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了核武器的产生对战争、军事战略、世界政治、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世界地位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并对后来中国核战略的形成产生了持久影响。

一、原子弹是“一只纸老虎”

1945年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实验基地,世界上第一

①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4、21页。

② 逢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338页;力平、马芷荪主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41页。

③ 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28—34页;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1949—1960)》,沈志华、李滨(Douglas A. Stiffler)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244页。

次原子弹试爆成功。第二天,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飞抵波茨坦,当面向正参加美、英、苏首脑会议的杜鲁门汇报了原子弹试爆的详细情况。杜鲁门后来回忆说,他听了史汀生的描述后“十分激动”,并称“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举”。^① 7月24日,在经过仔细权衡之后,杜鲁门利用一次会见,“偶然”对斯大林“提起”美国已经有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新武器”。斯大林当时平淡地表示很高兴,并鼓励说要“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② 杜鲁门此刻怀疑后者是否明白他说的是原子弹,不过就是此次会见后不久,斯大林即发出了苏联必须加快研制原子弹的命令。这是美苏两国领导人围绕核武器的第一次对话,双方背后的算计表明了核武器从一诞生,就没有被视为仅仅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而是立即被赋予了战略和政治意义。不久后,在遥远的延安窑洞里的中共领导人就对美国拥有了原子弹做出了回应。他们最初表达的那些看法不仅影响了战后中共几次重大决策,而且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

8月6日,美空军的两架B-29型轰炸机飞临日本广岛上空,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人类第一次将原子弹用于实战。这颗爆炸当量相当于2万吨TNT的原子弹,将一个有30多万居民的城市瞬间几乎夷为平地,13万人死亡,90%的建筑物被毁,其破坏性举世震惊。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很快就报道了广岛被原子弹炸毁的消息。该报道引述外电的描述说,美国的原子弹是“战争技术上的革命”,然后简要描述了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严重后果,说广岛城中烟火“高达四万英尺”,“仅见一片浓烟,外无他物”;城中有几条河也看不见了,“唯火焰弥漫速,犹如闪电”,“广岛所有生物都被烧死”。特别是盟军在投弹后还敦促日本尽快投降,“否则将以原子弹炸毁日本”。^③ 9日,美国空军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第二天,《解放日报》报道“原子弹又炸长崎”,同时附了一篇短文《一个原子炸弹威力的估计》,说广岛60%的城市建筑被炸毁,伤亡人数在10万以上。^④

总的看,《解放日报》对原子弹爆炸的报道与其他中外媒体相比,并不是很充分的。这同中共中央的一项决定有关。1945年4月18日,即苏联宣布终止《日苏中立条约》两周后,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晋察冀分局关于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的指示电报。该电报说,苏联终止《日苏中立条约》表明,苏军参加对日作

① [美]威廉·李海:《我在现场:罗斯福、杜鲁门顾问回忆录》,马登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62页。

② [美]《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李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53页。

③ 《解放日报》1945年8月9日。

④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0日。

战已为期不远,东亚国际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今后中共军队配合美英苏盟军作战的主要方面将是配合苏军作战,战略发展方向将转向东北。为配合这一战略转变,必须对指战员进行思想教育,包括克服对美国的盲目好感,以及相信只有苏联才是最先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宣传部门在有关盟军作战的报道中,要突出苏军的力量强大和作用。^①从那以后,《解放日报》报道有关美军在太平洋作战和海空军的巨大技术优势的内容减少了。即便如此,毛泽东读到《解放日报》有关美军使用原子弹的那些报道后,仍然感到不满意。他立即约见负责宣传工作的胡乔木等人,指示他们在宣传报道中需注意,“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②这是毛泽东首次对核武器表明自己的观点,简言之,就是不能夸大核武器在对日战争中的作用。

几乎与毛泽东发表上述看法同时,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中共领导人的战略关注立即转向对日反攻和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受降权等,毛泽东在此转折时刻,在党的高级干部中阐述了对美军使用原子弹的看法。8月13日,毛泽东在一次重要的干部会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第二,批评“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第三,严厉地要求对这种“唯武器论”思想“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③这时中共媒体的报道倾向已经出现明显变化。8月12日,《解放日报》转载英国《每日先驱论坛报》的一则消息,其内容是要求公布原子弹的秘密,反对“军事垄断的危险”。^④9月6日,《解放日报》又转载了一篇苏联杂志的文章,其核心观点是原子弹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世界政治问题”。^⑤大致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对核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持某种保留的态度,特别是在限制美国拥有原子弹这一事件的政治影响。

当时中共领导人已经开始在两个层面上认识核武器问题的:其一是核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当时具体是在对日战争中的作用;其二是谁掌握了核武器是更为严峻的战略性问题。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人的因素与武器的因素这两者谁决定战争的胜负,既是军事哲学问题,也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他强

① 《晋察冀分局关于积极配合苏联作战准备工作的指示》,1945年4月18日。

②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7页。

③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3—1134页。

④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2日。

⑤ 《原子弹不能解决世界政治问题》,《解放日报》1945年9月6日。

调不能夸大核武器的作用是他军事战略思想合逻辑的延伸。他从来都认为,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首先是战争的性质,即是否是正义战争;然后是站在正义一边的人而不是“物”,即他在那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明确阐述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①

进一步说,毛泽东对核武器问题的最初论述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是有战略意义的。毛泽东此时还不可能完全了解,原子弹的诞生和使用将给世界政治带来什么变化,但他肯定知道,此时坚持反对所谓“唯武器论”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性。中共领导的军队从诞生之日起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时,一直是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生存和作战的。如果承认武器装备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等于是承认中国革命战争必定要失败。如何评价核武器的作用也适用同样的战略逻辑,何况这时首先拥有和使用原子弹的是美国而不是苏联,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在转向对抗中国革命的轨道。

中国政局的急剧发展很快就证明,毛泽东一开始就决定控制对原子弹威力的宣传是有预见性的,也是很必要的。1946年夏季,中国全面内战爆发。中共中央有关是否下决心全面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及随后而来的是否下决心夺取全国政权等战略决策,都伴随着对美国是否介入中国内战及是否会使用核武器的判断与回应。在此背景下,毛泽东用极为生动明了的语言对核武器做出了他此后再也没有改变过的评价。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关“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时,直截了当地将原子弹比喻成一只同“美国反动派”一样的“纸老虎”。他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②毛泽东此时对核武器的论述固然包括了他对武器与战争关系的既有认知,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鼓舞和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的实际需要。

1947年夏季,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全面反攻,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开始在指战员中进行精神动员。他们的有关论述明确包括了“不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

^②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4—1195页。

怕”和“轻视”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援助甚至美军直接介入的内容。^①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回应有关美国是否会在中国使用原子弹的担心时,他们断言核武器在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破坏作用是有限的,“美国不可能用原子弹来对付人民战争”。^② 总之,中共领导人将原子弹比喻为“一只纸老虎”首先是服务于中共中央在国共内战中改变战略的需要;其次也反映了他们对核武器在不同类型、不同条件的战争中有其局限性的初步看法。

二、核武器“一定可以搞起来”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领导人的确已经认识到原子弹的诞生反映了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人民日报》当时就在评论文章中称之为“战争技术上的革命”。^③ 客观地看,美军在对日战争中首次使用原子弹在世界上产生的震撼性影响是巨大的,在中国国内特别是在科学界,的确也引起关注。中共领导人在1946年间已开始了解和联系研究火箭和核能领域的专家和留学生。^④ 后来随着苏联成功地进行第一次核爆炸,中国领导人对原子弹的论述随之出现重要变化。

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次试爆了原子弹,不过苏联并没有立即公布这一成果。9月5日,《人民日报》还在一篇为纪念打败日本的评论中说,是苏联参战在“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起了决定作用”,而不是美国投下的原子弹。^⑤ 这篇评论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批评那种认为是美国的原子弹造成了日本宣布投降的观点,从逻辑上同原子弹是“一只纸老虎”是一致的。18天后,苏联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被公之于世,中共中央很快就对苏联拥有核武器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评价。2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苏联塔斯社的一项声明。

① 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267—268页;《朱总司令在晋察冀野战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1947年12月;《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1948年1月1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邓小平:《在野战军直属股长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7年6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印1981年版,第390页。

② 周恩来:《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1947年9月2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三卷,第275页。

③ 《人民日报》1945年8月9日。

④ 参见巴丁编著:《战神浴火:国防科技史话》,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林中斌:《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刘戟锋等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⑤ 《击溃日本帝国主义苏联起了决定作用》,载《人民日报》1949年9月5日。

该声明说,苏联早已有了核武器,美国不必因此而惊恐万状。^①在当时各种新闻报道中,值得重视的是《人民日报》10月10日通过报道一些国家对苏联的评论,阐述了苏联拥有核武器将有利于打破美国的核垄断,美国再也不能忽视苏联的“和平建议”了。^②

综合这段时间的相关报道,大致可以看出其中已经存在了一套逻辑,包括:(1)核武器不是战争的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在打败日本的问题上不是决定性因素;(2)核武器掌握在谁的手中比核武器的威力要重要的多,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是苏联)掌握核武器将有利于世界和平;(3)苏联拥有核武器就有利于打破美国的垄断,从而造成对美国的一种制约。就第三点而言,可以说不论是否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之争,用拥有核武器来打破核垄断这种观念背后的逻辑即是承认,两个以上的国家掌握核武器要好于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一逻辑的确在影响中国领导人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前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访苏,是中国领导人萌生制造原子弹想法的开始。当时,斯大林对苏联研制原子弹的进展深感鼓舞,同时也希望能鼓舞苏联阵营的其他国家,包括用来坚定中国领导人加入苏联阵营的信心。很可能首先是他的行动引起了中共领导人对研制核武器的兴趣。

6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到达莫斯科。在随后的访问期间,斯大林邀请他观看了苏联研制原子弹的影片。斯大林在观影后说,科学技术在迅猛发展,军事科学也一样,要停止核武器发展是不可能的,现在需要关起门来“秘密地干”。根据刘少奇的翻译师哲回忆,可以从斯大林的谈话听出,苏联研制原子弹已经有了“新的突破”。^③也有论著说,是刘少奇主动提出希望观看研制核武器的设施,因为中共已经获悉苏联在展开这方面工作,而斯大林是有些勉强地提供了影像纪录片,以证明苏联的确取得了进展。^④

1949年12月中旬到翌年2月,毛泽东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在此期间,斯大林亲自陪他观看了记录苏联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的资料影片。毛泽东对此一定印象深刻,这是他第一次比较直观地看到原子弹爆炸的巨大威力。他不久后曾对警卫员叶子龙说,这次访苏“开眼界哩!”,并且表示出中国“也可

① 《人民日报》1949年9月26日。

② 《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0日。

③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页。

④ 巴丁编著:《战神浴火:国防科技史话》,第236页。

以搞一点”。^①这是目前能获知的中国领导人产生研制核武器的想法的最早时间。

2月14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第一条明确规定,当缔约一方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和其他援助”。^②这一条是由苏方拟写的。^③由于苏联已拥有核武器,这相当于规定了苏联将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但随后发生的朝鲜战争肯定使这一条的实际效力在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大打折扣。首先是在朝鲜半岛,当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朝鲜面临灭国之灾时,苏联领导人的选择包括不直接参战。随后是在中国领导人决定派遣志愿军赴朝参战的重要时刻,斯大林违背了他最初的承诺,不肯立即派苏联空军为中国军队在朝作战提供空中掩护。^④所有这些在当时就是为了避免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对于从来都将“自力更生”视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准则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样的教训会是刻骨铭心的。他们的战略和政治经验都决定了,他们不会将维护重大的战略利益依赖于包括盟国苏联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核保护伞。

从中国国防战略形成的大背景看,中国领导决心研制原子弹同来自美国的核威胁有密切关系。中国第一次面临美国核威胁是在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11月30日,由于志愿军连续发动两次战役重创联合国军,杜鲁门在华盛顿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发出核威胁。他声称美国政府正在加强军事力量以应付中国参战后的严峻局势,有必要就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所有的武器”。^⑤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为了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条件停战,也曾宣称美军考虑在朝鲜半岛使用战术核武器。^⑥

中国第二次面临美国核威胁是在1954—1955年的台海危机期间。1955年初,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阻止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一面在台海地区大规模集结海空军力量,同时也在讨论一旦解放军发起跨海作战,美国是否要动用战术核武器,等等。3月,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有可

① 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186页。

②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人民日报》1950年2月15日。

③ 参见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1949—1960)》,第208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⑤ 〔美〕《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第472—473页。

⑥ 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页。

能使用战术核武器。^① 3月15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声称,美国有准备在台海使用核武器。^② 另外还有间接的事件也在产生影响。在1954年初,美国军方曾制定向在越南法军提供空中支持的方案,其中就包括了在相关地区部署携带战术核武器的作战飞机。^③ 这时中国正执行援越抗法政策,向越南派遣了军事代表团并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

1954年在冷战历史中素有“炸弹年”之称。苏联在1953年进行了氢弹试验,它与美国在核武器领域的差距呈缩小的趋势,所以,美国政府内部针对核武器和核战略的讨论紧锣密鼓,有关的舆论也是甚嚣尘上。

1月12日,杜勒斯在纽约外交委员会发表演讲,宣布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实施一项新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他说今后不论战争发生在哪里,美国都应该“主要依靠大规模的立即报复力量,采用的手段和地点都得按照我们的选择”。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随后的演讲中发出更加直截威胁。他声称,美国应该主要依靠大规模的机动的报复力量,“打击侵略的主要根据地,时间和地点均得由我们决定”。^④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战略加剧了核军备竞赛,也引发了针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国际舆论的发酵。在炙热的气氛中发生的台海危机,难免成为美国内鹰派推行强硬政策的重要理由,他们的喧嚣难免会加重中国领导人的担心。

1955年1月7日、8日两天,《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署名江南的评论文章,谴责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方向加强军事部署和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这些文章指责“美国将军们最近越来越喜欢挥舞原子武器了”,他们“在东方和西方叫嚷使用原子武器”是为了恫吓中国,但“那是在白费气力”,因为“原子武器早已不是美国垄断的专利品”。^⑤ 从后来的发展看,文章中有关打破核垄断的论述已经透露了中国有可能决定研制核武器。也就是在6天后,即1月15日,中国领导人做出了研制核武器的决定。

如果回溯具体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研制核武器是

① “Cabinet Meeting, March 11, 1955, Dwight D. Eisenhower: Paper as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1953-1961,” Box 4, (Ann Whiteman File).

② [美]杜勒斯:《杜勒斯言论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66页。

③ 蔡佳禾:《双重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④ 转引自[英]科拉尔·贝尔:《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云汀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133页。

⑤ 江南:《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人民对战争玩火者是不会容情的》,《人民日报》1955年1月7、8日。

在朝鲜战争结束不久,其直接的动力是他们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愿望。在1952年开始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并未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内容。这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国家财政存在困难。1953年9月8日,主持军队工作的彭德怀向毛泽东提出修改1952年7月制订的五年军事建设计划,获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的建议主要是基于朝鲜战争结束的新形势,应缩减军费开支,包括了减少进口军事装备等,而压缩军费也是毛泽东本人首先提出的。^①从12月7日到翌年(1954年)1月26日,中央军委召开制定军事发展规划的全军高干会议。在这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并没有讨论研制核武器的问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没有在考虑研制核武器问题。

11月间,彭德怀在为全军高级干部会议做发言准备时就曾约见高岗,后者此时正负责全国的经济计划工作,并担任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在会见中谈到研发核武器的愿景,提出能否用10年时间在军事技术领域赶上美国,“美国有的武器我们都有(包括原子弹)”。^②高岗当时未予采纳。在这段时间,中国科学界也在争取将研发核能技术列入国家计划,如钱三强等也向高岗提出过这类建议。

彭德怀这时提出研制核武器的设想,其动力直接来自毛泽东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的抱负。^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未来国防必须现代化的愿景,抗美援朝战争则加强了中国领导人的愿望。在第二次战役胜利后,斯大林曾向毛泽东发贺电,其中说道“正如苏军在与第一流武装的德军作战取得了现代化战争的丰富经验并成为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一样,在反击现代化和装备精良的美军的战争中,中国军队无疑地将取得现代化战争的丰富经验,其本身也将变成完全现代化的、装备精良的、威力强大的军队”^④。毛泽东由此提出了“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彭德怀则在有关会议上说,毛泽东的这项指示“是军队工作的依据”。^⑤第一支世界最优良的军队当时就是指苏军,解放军要成为包括“装备精良的”世界第二优良军队,在逻辑上也是应该拥有核武器的。

① 参见彭德怀传记组:《彭德怀全传》(三),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5、104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58页。

② 转引自彭德怀传记组:《彭德怀全传》(三),第1078页。

③ 同上书,第1043页。

④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重大胜利》,1950年12月1日,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50.8—1951.8》第三卷,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453页。

⑤ 彭德怀传记组:《彭德怀全传》(三),第1043页。

这个时期,苏联针对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1954年10月《巴黎协定》签署后欧洲安全形势的变化,决定加强核军备以抗衡美国的核战略。苏军提出了一项以发展核武器和导弹运载工具为中心的“火箭核战略”;同时,为了对抗美国与西欧国家军事安全关系的发展,决定强化与盟国之间的军事一体化。1954年11月29日,苏联同7个东欧国家召开会议,筹组华沙条约集团。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出席会议并发表声明,支持会议的决定。^①

美苏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和苏联阵营军事一体化进程等,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领导人争取从苏联得到必要帮助的努力。1954年9月,彭德怀率领包括很多解放军著名战将如刘伯承、粟裕、刘亚楼、许光达、陈赓等的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他们应邀专门前往托斯克观看名为“雪暴”的核爆炸军事演习。行前,彭德怀曾专门会见钱三强,了解研制原子弹的有关知识。在苏联的核试验基地,这些战将第一次目睹了蘑菇云升腾,以及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造成的巨大破坏力。演习结束后,布尔加宁将一把原子弹起爆的钥匙赠送给彭德怀。在中国的国防决策体制中,这批将领均位居关键岗位,他们对拥有先进武器的渴望是可想而知的,经历了这样的视觉冲击后必定会倾向于研制核武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9月30日,彭德怀在准备与即将到访的赫鲁晓夫会谈的方案时告诉李富春,必须将研制原子弹列入会谈计划;宁可削减一些其他项目,也要列上研制原子弹。^②

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作为大国的身份的认同,也是导致中国领导人将是否拥有核武器同中国的世界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源头。早在1949年9月23日,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提出,“采取无条件禁用原子武器并实施充分与严格的国际管制的措施,已不容再事拖延”。尤为重要的是,他说美、苏、英、法、中等“五强”负有“主要责任”来解决这类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③当时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还是国民政府的官员,不过维辛斯基这时对中国“五强”地位的确认,肯定已经考虑到苏联很快就会将此称谓转归将在几天后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前,中苏两党领导人的交往已经非常密切,双方就中共中央建国的计划和进程保持着密切沟通。苏联方面肯定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特别是9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维辛斯

^①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一九四二—一九七六》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961—962页。

^② 参见梁东元:《原子弹调查》,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1页。

^③ 《人民日报》1949年9月27日。

基的上述讲话,这反映出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理当位列五强。

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是世界大国地位的认同在新中国成立后几次遭受挫折。比较典型的是1954年初,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为邀请中国参加解决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以及该会议的名称及形式的争论。这次争论严重影响了中国领导人的思考。在苏联外长提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来讨论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建议后,杜勒斯先是反对召开有中国外长参加的国际会议,后来又为了贬低中国的地位,将苏联提议的五大国外长会议改称为“有各国外长参加”的会议。英法外长也在此问题上提出各种附加条件。^①

中国领导人当时对是否“五大国外长”参加会议是重视的,很关注这次会议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大国外交层次。在2月26日接到苏方转交的有关通报后,中国领导人曾提出,日内瓦会议是否有“五大国外长”自始至终参与的问题。当时苏方答复,第一阶段是这样,之后“看起来”就不是了。^② 事实是,日内瓦会议最终没有成为苏联最初提议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后来,毛泽东曾很明确地阐述了研制核武器关乎中国的威望和世界地位,而不仅仅是维护国家基本安全的问题。他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贬损中国,是因为中国“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所以,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③

当时每个中国领导人都知道,研制原子弹的最佳途径就是获得苏联的帮助,这是他们的共识。1954年9月29日至10月12日,赫鲁晓夫率苏联代表团访华。10月3日,毛泽东在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直接提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希望苏联提供帮助。毛泽东这里提出的是两项要求,它们分别反映了中国核物理专家和军队领导人关注的不同重点。前者关注发展原子能科学和核工业;后者的目标就是研制核武器。赫

①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提供的钴胺与四国外长柏林会议的情况》,1954年2月27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②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交来关于邀请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材料》,1954年3月2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9—11页。

③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1页。

鲁晓夫此次访华确实希望进一步提升中苏关系,包括纠正斯大林所做有损中国权益的事情,以及进一步提供援助来帮助中国更快地建成工业化国家。^① 不过,他对毛泽东提出帮助研制核武器的要求还是没有准备,略犹豫后即表示,中国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可以了,而且研制原子弹成本很高,苏联可以帮着先建个“小型原子堆”,以帮助中方培训科技人员,等等。毛泽东表示会考虑赫鲁晓夫的建议。^②

赫鲁晓夫的表态相当于苏联可以帮助中国研发和平利用核能的进程,但这肯定有利于中国研制核武器,实际上中国领导人也是这样理解的。10月23日,毛泽东同到北京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告诉后者,中国“正在开始研究”核武器,尽管“一下子还搞不起来”。^③ 尼赫鲁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华的非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而毛泽东这是首次向苏联阵营以外国家的领导人透露研制核武器的决定。联系到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7日会议决定“打开大门”、建立亚洲和平统一阵线这一背景,毛泽东向尼赫鲁透露这一想法,至少他认为这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和推行新的亚洲政策。^④

赫鲁晓夫回国后,中苏开始就原子能技术合作展开磋商,并在1955年1月上旬就苏联向中国提供包括核反应堆在内的重要援助,达成初步协议。苏联领导人在此期间决定向中国提供上述援助,与美国同西欧国家签署《巴黎协定》加强军事合作,包括在欧洲加强核军备有直接关系。苏联正在筹组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抗的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苏联领导人十分清楚这时得到中国赞成与配合的重要意义。无论苏联基于多么复杂的考虑,中国这时毕竟得到了为研制核武器所不可缺少的苏联援助。所以,毛泽东在前述1月15日会议上很有信心地说,核工业研制“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⑤

三天后,1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苏联部长会议声明,宣布苏联将援助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东德发展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计划。

① [俄]尤·米·加列诺维奇:《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飞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8页。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版),第572—573页。

③ 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1954年10月23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67页。

④ 关于1945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可参见毛泽东:《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45年7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33页。

⑤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核工业》,第14页。

苏联提供的援助包括设计、供给设备及建设可达到5000千瓦热能的实验性原子堆、原子微粒加速器,供给必要数量的原子堆和科学研究用的可分裂物质,以及这些国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可以到苏联了解相关科学研究和实验性原子堆的情况,等等。^①

1月20日,中苏签署了苏联协助中国勘探和开采铀矿的议定书。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做有关发展核能和苏联提供援助的报告。^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进行研究和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有关展开原子能研究和发展的决定很快启动并推进了研制核武器的决策进程。国务院的决议公布不久,2月18日,彭德怀在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1955年度军事工作时,首次提出了“要逐步研制和争取生产核子武器”。^③研制核武器问题从此开始提上军事建设的日程,以此为标志,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决策过程基本完成了。

三、“搞一点”核武器

中国领导人在下决心启动研制核武器这个阶段,比较集中地阐述了他们对核武器问题的认识。如果结合十年以来他们的有关思考和论述,可以说,他们这时初步形成了独特的核战略思想,其主要内容极大影响了后来中国核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首先,中国领导人即使在下决心研制核武器之时,仍然坚持一贯的判断,认为核武器作为一种新式武器的确会造成大规模的毁坏,但绝不可能因此就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他们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还不发达和科技水平低,掌握核武器尚需时日,才有意贬低核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毛泽东在前述会见尼赫鲁时就很有针对性地说,战争武器从冷兵器过渡到热兵器,再到核武器,“除了死伤的人数以外,没有什么差别”,“随着武器的变化,无非是

^① 《苏联部长会议发表声明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我国和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帮助》,《人民日报》1955年1月18日。

^② 周恩来:《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1955年1月3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7—362页。

^③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590页;另参见彭德怀传记组:《彭德怀全传》(三),第1079页。

死伤的人数更多而已”。^①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从内战时期开始就一直认为,原子弹很难被使用到广大农村和山区,其“危害最厉害的是工业集中、人口集中的国家”。^②这种判断是中国领导人反对和轻视核威慑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上述认知是毛泽东一直十分反感和蔑视来自美国的核威胁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任何这方面的哪怕是一点暗示,他都必定要予以回击,这比较典型地反映在他同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的谈话中。1955年1月28日,孙士敦向毛泽东递呈国书,席间前者描述了美国的氢弹威力如何巨大,几颗投下便足以毁灭中国。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形象语言予以尖锐的反驳,说“原子弹顶厉害也不过是把地球打穿,如果能把地球打穿,从中国打进去,从地球那面冒出来,那面正好是美国”,“美国想用恐怖吓倒我们,但是吓不倒我们。”^③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不仅没有核武器,而且其他武器装备与美国相比也处于落后状态。所以,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在面临核威慑(当时就是美国的核威慑)时,必须继续坚持在内战时期就提出的“不怕”美国的任何威胁、原子弹也是“一只纸老虎”的论述。^④否则,就只有不断地妥协下去了,其消极影响将是战略性的。周恩来后来在同越南军队领导人武元甲的一次会谈时说:“在帝国主义面前,强调核战争的毁灭性,劝帝国主义不要战争,放下武器,这是可笑的。”^⑤

值得重视的是,中国领导人这时的确认为,核武器在未来战争中是不可使用的,或者说使用的可能性非常之低。在这方面,周恩来的有关论述是有代表性的。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系统阐述了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问题的认识,其中说到“的确有可能造成一种力量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因为现在美国和苏联都掌握了原子武器”,从而形成了有力的相互制约,加

① 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1954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67页。

② 《周恩来同志在西北高干扩大会议上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1948年1月11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59页;周恩来:《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第358页。

③ 周恩来:《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第358页。

④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33页。

⑤ 周恩来:《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1962年10月7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439页。

之国际社会的反对声浪在日益高涨。他用生化武器被禁止使用的历史为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了毒气，由于参战各国都掌握了这种武器，“你用我也用，战争就无法进行了”，所以“国际上订立了禁止使用毒气的公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也没有敢用毒气”。所以从这种发展趋势看，“现在也有可能禁止使用原子武器”。^①

在中国领导人的论述逻辑中，核武器之不可使用固然是因为它的巨大破坏性将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之严重，使用者也不能幸免——毛泽东在同尼赫鲁会谈时说，核武器“既然无法控制，问题也就解决了”，“毁灭地球，人类是不允许的”。^②但是，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确切保证主要是打破一国（后来发展成打破美苏）的核垄断。这是中国领导人最初称赞苏联拥有核武器的重要理由，也是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发展核能和研制核武器的重要原因。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一方面要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另一方面我们要掌握原子能”。^③毛泽东每提到发展核武器一类武器时，通常会说“搞一点”。其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核武器被使用的可能性很低，只要“搞一点”达到打破核垄断的目的即可。

与消除核武器造成的安全威胁相比，加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愿望，对中国领导人决定研制核武器的影响至少同样重要。如前所述，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战略思维中定义的大国、强国，就是要拥有核武器。有核武器未必是大国、强国，没有核武器就一定不是大国、强国。

如前所述，在中国的决策过程中，一直有两个群体在起作用。一个群体是一批核物理专家，他们是在追随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强烈建议中国应该发展核工业，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尽早达到世界的前沿。他们的观点明确体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决策中，即认识到世界已经进入“原子时代”，中国科技发展必须跟上世界潮流。^④另一个群体则是彭德怀为代表的军事领导人，不赘述。这两个群体论述的本质都是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加强中国的世界地位。此外，则是不断出现的重大事件如朝鲜战争、东南沿海作战中美国的介入、苏联核军

① 周恩来：《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第359页。

② 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1954年10月23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67页；周恩来：《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1962年10月7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359页。

③ 周恩来：《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第359页。

④ 同上书，第357页。

备和军事战略的发展等,它们不断刺激中国领导人的思考,并引起他们对核武器问题的关注与重视。所以,当毛泽东决定要研制核武器时,他并没有改变对核武器不过就是一种新武器而已的看法,但有没有它则关乎中国的国际地位,即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① 总之,中国领导人对研制核武器的这些独特的思考导致中国的核战略将打破核垄断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作为重要的目标。

结 语

中国领导人从开始思考原子弹问题到决定研制核武器的十年,包括了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前期^②两个历史阶段,以及世界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本文的研究证明,其间中国领导人在很多不同的背景下的思考内容既独特也很丰富,其中的诸多部分是有明显连续性的,而在做出研制最终决定时的关键动力,的确是同建设世界大国的目标紧密相连的。在冷战早期,中国利用中苏同盟而获得至关重要的外援,从而迅速迈出建设核大国的步伐,这对东亚乃至世界格局都有长远的影响,而且中国最终获得了超出东亚地区的战略性影响力。这一结果或许也可以用来印证中国领导人当年下决心研制核武器时的关键动力。20世纪60年代末,在中国战略思维和安全话语中出现“中美苏大三角”的概念,其源头即在此。

^① 毛泽东:《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导弹》,1958年6月2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87页。

^② 这里的“新中国成立前期”指1949年10月1日建国到1955年。